

經濟壓倒民主？一些回歸後民調數據的分析

◎ 李立峯 陳韜文

「七一」遊行之後，民主進程重新成為社會議程中的一個重要議題。一些評論員及學者認為香港的中產階級已經覺醒，加速民主化是大勢所趨。那邊廂，不少政府官員及親中人士卻認為市民只是因經濟持續不景而對政府有所不滿。只要經濟好起來，繁榮自然穩定，穩定自能壓倒一切。

零三年炎夏，香港經濟和社會氣氛開始出現一點點的起色。中央一邊「送禮」一邊「挺董」。特首的民望看來又沒有那麼糟了。縱使是傾向民主的學者和評論員，都以為特區和「保皇黨」們又可過一關，但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區議會選舉，無論是投票率或各政黨的勝負，都指向所謂「七一效應」。些微的經濟好轉，沒有令那二十萬「新選民」卻步。

這一次區議會選舉似乎否定了「經濟好，香港人就不會喊民主」這「港版經濟決定論」，但這是「七一」後才出現的現象嗎？這論調在以往的時間裏到底有沒有事實根據呢？具體點說，在回歸後及「七一」前這六年間，香港市民對政府及特首的評價，以及對民主的訴求，和香港的經濟環境到底有著甚麼樣的關係？以下，筆者會根據回歸後首六年的一些民調數字及經濟數據作出分析，嘗試為以上問題提供一些初步答案。

一 經濟環境和政府民望

筆者通過研究助理的協助搜集了九七年七月至零三年六月間以下幾項有關香港經濟狀況的數據：(1)特區政府所記錄的每月份失業率，(2)差餉物業估價署按月計算的私人住宅價格指數，(3)每一個月首個股市交易日開市時的恒生指數，以及(4)每季的本地生產總值。這些經濟指標之間固然有一定的關係。表一顯示，私人住宅價格指數與失業率之間的相關系數尤其高，恒生指數和其他指標之間的關係則較弱。恒生指數日以繼夜的上上落落，以每月首個交易日開市時的指數作為指標，其「可靠性」難免會低一點，但這文章不是專門的對股市的研究，所以筆者選擇了一個簡單的指標來使用，應該是足夠的。

表一 各經濟指標間之相關係數

	失業率	恒生指數	本地生產總值	物業售價指數
失業率	----	-.50**	-.63**	-.82**
恒生指數	-.50**	----	.26*	.20
本地生產總值	-.63**	.26*	----	.52**
物業售價指數	-.82**	.20	.52**	----

註：

表中所示為相關係數。

*代表系數達到了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 ($p < .05$)；

**則代表系數達到了高度顯著的程度 ($p < .01$)。

有了這些指標，我們便可以分析經濟狀況對「民意」的影響。我們可先看經濟狀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斷定了市民對特首及政府的評價。這裏，筆者借用了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網站所提供的資料¹，結合以上的經濟指標來作統計學上的迴歸分析。表二的上半部總結了這分析的結果。

表二 經濟指標對政府及特首評價之影響

	董建華評分	政府滿意程度	政府不滿程度
失業率	-.12	.00	.13
恒生指數	.02	.14	-.20*
本地生產總值	-.10	.00	.16*
物業售價指數	.83**	.77**	-.78**
R ²	79.6%**	64.8%**	77.6%**
失業率	-.06	.04	.08
恒生指數	.02	.14	-.20*
本地生產總值	-.10	-.00	.17*
物業售價指數	.85**	.78**	-.80**
社會或政治危機	-.28**	-.18*	.22**
R ²	86.9%**	67.8%**	82.0%**

註：

表中所示為標準化迴歸係數。「政府滿意程度」為調查中對政府的表現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的受訪者比例；不滿程度則為對政府表現表示不滿或非常不滿的比例。

*代表系數達到了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 ($p < .05$)；

**則代表系數達到了高度顯著的程度 ($p < .01$)。

整體而言，經濟指標對特首及政府的民望有著很強大的影響。這從表二所示的R²值裏可看出來。以特首評分為例，迴歸分析的R²值是百分之七十九點六。用最簡單的話說，這代表香港回歸後首六年裏特首評分的每月升跌所構成的「變異值」(Variance)，有百分之七十九點六可以用那四個經濟指標的「變異值」來解釋。同樣地，市民對政府滿意程度及不滿程度每月與每月之間的起跌，也分別有百分之六十五及百分之七十八可以用四項經濟指標來解釋掉。²

除了經濟狀況之外，當香港出現社會危機或政治爭議的時候，特首及政府的民望也可能被影

響。所以，筆者再在分析中加上一個變量，就是到底香港在不同的月份裏是否有社會或政治危機存在。不同的學者或評論員可能對社會或政治危機有不同的定義，這裏筆者只根據個人的記憶及觀感，將以下事件列為社會或政治危機：1）九八年一至三月香港首次爆發禽流感，2）九九年十月及十一月間連串的公屋醜聞，3）零零年七月至九月間的民調風波，4）零二年十月及十一月間社會對國安法的激烈討論，5）零三年二月梁錦松買車事件，6）同年三至五月的沙士疫潮，以及7）同年六月的「七一」遊行前夕。³以上這些月份，在「危機」這變量上的數值都是1，所有其他月份的數值都是零。我們可以預期的結果是特首及政府民望在「危機月份」裏會較低。

表二下半部分所示的分析結果引證了社會及政治危機對特首及政府民望的影響。在「危機月份」裏，特首的評分比在其他月份時平均低三點六，滿意政府的市民比例平均少三點三個百分點，不滿政府的比例則平均多五點八個百分點。⁴值得注意的是，當四項經濟指標及一個很簡單的有關「社會危機」的變量加起來時⁵，已經可以解釋到特首評分起跌的百分之八十六點九，也可以解釋到市民對政府不滿的起跌的百分之八十二。

換句話說，從宏觀層面看，政府及特首民望的起跌大部分都可以歸因於經濟因素。而經濟因素若再加上那間歇性出現的社會或政治危機，已差不多可以完全解釋政府及特首民望在回歸後首六年間的起跌。

不過，筆者要強調的是，以上結論只是從「宏觀層面」分析的結果。也就是說，這文章所分析的，是香港的整體經濟及社會狀況，以及整體市民對特首及政府的評價。如果我們在個人層次上作分析，嘗試理解個別市民怎樣評價特首及政府，我們可能會發現很多方面的因素其實都在發生作用。但表二所顯示的，是當所有個別市民對政府及特首的評分被整合起來時，所得出的整體評分極大程度上建基於經濟狀況之上。

另外，在四項經濟指標當中，其實只有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強烈地影響著市民對特首及特區政府的評價。這是不難理解的。恒生指數的起跌始終和政府的政策沒有最明顯而直接的關聯。失業所直接影響到的人在全港市民的比例上不會太多，但樓價的下滑卻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影響了所有已經置業的香港人。樓價相對於本地生產總值來說又沒有那麼抽象。更重要的，是香港市民普遍認為政府的錯誤政策直接導致樓市持續下挫。概念上而言，就是在市民心中特區政府對樓市下跌有「因果責任」（causal responsibility），故此政府民望便和樓價掛上了鉤。

還有一點須指出的，是表二中的分析假設了經濟狀況對民意有接近即時的影響。亦即是說，當某月份裏香港經濟有好轉時，特首及政府的民望也會在該月裏上升，反之亦然。理論上，另一種可能情況是經濟轉變對民意的影響需經歷一段時間才會出現——可能是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等都說不定。可是，筆者以現有數據作過以不同假設為基礎的分析，發現以「經濟狀況對民意有即時影響」這假設為基礎的分析解釋力最高。這就顯示了「即時影響」這假設符合現實情況。

無論如何，根據表二的結果作推論，我們可以預期，當香港經濟好轉而樓市復甦時，政府及特首的民望也會節節上升。這似乎就是政府官員及親中人士所期望的情況。其實，這種預期本就很正常，除非我們認為經濟好壞和政府施政無關，否則，經濟好時給政府打高分一些，是合情合理的。經濟狀況對政府民望的影響在很多民主國家都是顯著的。以美國為例，經濟狀況好時，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的醜聞拖不垮克林頓（Bill Clinton）；經濟情況

差時，海灣戰爭的勝利不足以助老布殊（George H. W. Bush）連任。⁶

問題是，表二的分析並不代表香港市民不會因應政府的構成及產生方法來評價政府。表二所分析的是政府民望在回歸後六年間的變化，而香港的政治制度在這段期間內，除建立了一個被很多人視為有名無實的「問責制」外，並沒有甚麼重大改變。變化中的民望當然不能以沒有變過的政治制度來解釋。但如果有一天香港的政治制度起了重大改變的話，那特首和政府的民望仍有可能會因此而大變。

這也指向了過分著重定期民意調查的一個不良傾向，就是大家的眼光（包括這篇文章本身）很容易就集中在每次調查之間的變遷上，而忽略了在這起跌背後，可能有一些長久不變的基本問題。不過，以本文的中心旨趣而言，這一點是題外話了。⁷

二 經濟環境與民主訴求

以上分析了經濟狀況對特首及政府民望的影響。但市民對政府及特首的評價是一回事，對民主的支持或甚至堅持可以完全是另一回事。「港版經濟決定論」的主要論調是經濟壓倒民主。那麼，經濟好轉是否真的會淡化市民對民主的訴求？這是我們接著的分析重點。筆者再次借用了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網站所提供的資料。從九七年七月到現在，該研究中心一直定期訪問香港市民有關他們對特區政府推動民主步伐的滿意程度。⁸有關調查不是每個月都有進行。但從九七年七月到零三年六月期間，該機構分別在五十一個不同的月份裏舉行了有關調查，這對本文的分析是足夠的了。

從表三，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及特首民望與市民對政府推動民主步伐的評估之間的關係。確切一點，兩者之間根本沒有甚麼特定的關聯。當政府及特首民望上升的時候，市民對特區政府推動民主步伐的滿意或不滿程度不會同時上升或下降。

表三 特首及政府評價與對民主狀況評估之相關

	董建華評分	政府滿意程度	政府不滿程度	民主滿意程度	民主不滿程度
董建華評分	----	.84**	-.92**	-.13	-.18
政府滿意程度	.84**	----	-.83**	-.08	.00
政府不滿程度	-.92**	-.83**	----	.21	.10
民主滿意程度	-.13	-.08	.21	----	-.54**
民主不滿程度	-.18	.00	.10	-.54**	----

註：

表中所示為相關係數。

*代表系數達到了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 $p < .05$ ）；

**則代表系數達到了高度顯著的程度（ $p < .01$ ）。

表面上，這結果似乎支持著「經濟決定論」，因政府民望起跌並不建基於其推動民主化的工作之上。不過，既然政府民望和政府推動民主步伐的評估無關，那麼縱使經濟狀況和政府民望有很大的關係，也不能代表經濟狀況一定會跟民主訴求有關了。筆者便以之前所用過的迴歸分析法來測試經濟好壞及社會或政治危機會否影響到市民對民主的訴求。表四展示了這一分析的結果。

果然，經濟狀況對市民滿意民主步伐的程度只有很微弱的影響。同時，經濟狀況對市民不滿

民主步伐的程度更是毫無影響的。真正觸發市民對政府在推動民主工作上不滿的是那一次又一次的社會或政治危機。根據結果，在那些被視為有政治或社會危機的月份中，不滿意香港政府推動民主步伐的市民比例，比其他月份平均高出百分之四點二。⁹

基本上，四項經濟指標當中只有失業率和滿意政府推動民主步伐的市民比例有著統計學上的顯著關係。但這個關係卻是一個正相關——當失業惡化的時候，滿意政府推動民主步伐的市民比例竟是隨之而上升。亦即是說，根據回歸後六年來的調查數字和經濟數據，香港政府若想市民滿意其推動民主步伐方面的工作，方法就是將失業率弄得再高一點！

這看似荒謬的結果其實一點也不荒謬。當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市民很可能再沒有太多時間去關心政治，所以他們便會對政治狀況較容易表示滿意，同時希望政府能集中火力處理經濟問題。這解釋也切合了表四中只有失業率和市民滿意政府推動民主步伐有關連這一結果上。因為在四個經濟指標所代表的四種經濟問題中，政府大概對失業問題有最大的「治理責任」（treatment responsibility）。¹⁰政府雖被不少市民視為樓市下跌的罪魁禍首，但與其說市民希望政府改善樓市，不如說市民希望政府在樓市問題上無為而治。絕大部分市民亦不會認為政府有責任令股市上升，當年政府入市對付國際炒家，只不過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而已。但失業率卻是政府須認真面對及處理的問題，所以當失業高企，市民認為政府要首先應付這問題的時候，他們也不會太過在意政治問題。

表四 經濟指標對民主狀況評估之影響

	對民主步伐滿意		對民主步伐不滿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一	模型二
失業率	.53	.32**	.19	-.03
恒生指數	-.14	----	.25	----
本地生產總值	.24	.17	-.04	-.03
物業售價指數	.03	----	.21	----
社會或政治危機	-.22	.21	.46**	.46**
R ²	23.2%*	20.0%*	25.3%*	24.2%**
Adjusted R ²	14.7%*	14.9%*	17.0%*	19.4%**

註：

表中所示為標準化迴歸係數。對「民主狀況滿意」為調查中對香港的民主現狀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的比例；「對民主狀況不滿」則為對民主現狀表示不滿或非常不滿的比例。

此處的分析只有二十三個數據點，不適合有太多的自變量。模型二是根據模型一的結果所作的修正，用意是將在模型一的分析中所顯示出的一些不重要的變量刪除以簡化迴歸分析。

*代表係數達到了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 $p < .05$ ）；

**則代表係數達到了高度顯著的程度（ $p < .01$ ）。

以上的詮釋也符合了一些本地學者對回歸後香港政治生態及公共論述的觀察。¹¹但我們也可以在這裏用民調數字來直接驗證這一詮釋。港大民意研究中心一直定期訪問市民心中的「社會議程」。問卷的題目讓市民選擇到底他們覺得當前香港最重要的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還是「社會問題」。不過，這項調查做得不算很頻密，回歸後首六年內只有三十個月有。而同一個月中，既有社會議程調查，又有民主步伐滿意程度調查在進行的，只有二十三次。根據表四的結果，筆者在這裏化繁為簡，只集中處理三個變量之間的關係——失業率、滿意政府推動民主步伐的市民比例，及以經濟問題為最重要社會議題的市民比例。

表五展示了這三個變量之間的相互關係。當失業情況嚴重時，在民調中以經濟問題為首要社會議題的市民比例的確會隨之而上升。同時，當越多人認為經濟問題最重要時，也有越多人滿意政府推動民主的步伐。這可算是初步吻合了先前的說法。

不過，表五所展示的只是相關性，而不是因果關係。有很多不同的情況都可以導致表五的結果。以這部分統計的分析目的而言，有兩種最簡單，但亦是在概念上最重要的情況是須要被分辨出來的。第一種可能情況，是失業惡化首先導致市民更關心經濟問題，而後者則再導致市民較容易滿意民主現狀，這也就是文章先前提出的觀點。第二種可能情況，是失業惡化導致市民更關心經濟問題，同時，失業惡化也透過其他方式和渠道令市民更容易滿意民主現狀，在這種情況下，滿意民主現狀和關心經濟問題也會呈正相關，但兩者之間卻是完全沒有因果關聯的。

表五 失業率、民主訴求，和社會議程之相關性

	失業率	滿意民主步伐	以經濟為首要議題
失業率	----	.48**	.75**
滿意民主步伐	.37**	----	.37**
以經濟為首要議題	.75**	.37*	----

註：

表中所示為相關係數。

*代表系數達到了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 ($p < .05$)；

**則代表系數達到了高度顯著的程度 ($p < .01$)。

幸運的是，要分辨這兩種情況其實很容易。我們只要再進行多一次迴歸分析就可以了。我們可以嘗試用失業率及社會議程來解釋市民對政府推動民主步伐的滿意程度。如果以上所說的第一種情況屬實，那麼在迴歸分析中，將只有社會議程能解釋市民對政府推動民主步伐的滿意程度。相反，如果以上所說的第二種情況屬實，在迴歸分析中，將只有失業率可以解釋市民對政府推動民主步伐的滿意程度。而根據筆者對數據進行的測試，實際結果是，在迴歸分析中只有社會議程能解釋市民對政府推動民主步伐的滿意程度。換句話說，我們有統計分析結果支持先前提出的觀點——經濟差令香港市民關注點放在經濟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上，所以他們對民主步伐會較易感到滿意。

三 「純經濟城市」不可再

從理論看，當一個社會的經濟發達之後，市民會將關注點放到一些非物質性的價值取向上，這現象在西方的政治學及民意研究中被叫作「後物質主義」。¹²其理論假設是人的價值取向取決於少年時的生活環境及社會化過程，而人最想追求的，往往是那些社會上本就很缺乏的東西。所以，當一個社會上物質生活不是大問題的時候，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人，便更有可能將生活的重點放在非物質性的價值上。歐美社會中人民積極參與環保、人權觀念的擴張，甚至動物權的提倡，都是這後物質主義的表象之一。民主政制也是一個非物質性的價值取向。事實上，香港現時的民主運動的推動者，不主要是那些在香港經濟高度發展中長大，而物質生活又相對地充裕的新興中產階級嗎？

這也是為甚麼香港不可能變回一個「純經濟城市」。無論香港過去幾年的經濟狀況有多壞，大部分香港人所過的生活仍遠遠比那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優勝。現今香港三十歲以下的年

青人，都在七十年代中或以後出生，當中家庭背景固然有差異，但他們都沒試過制水，沒見過多少木屋區，也至少享受了九年免費教育。這不代表香港已完全進入後物質時代。也許，整體而言香港人仍然「貪錢」。但今時今日，要香港人除了錢以外甚麼都不追求是沒有可能的。

不過，嚴格來說，以上的分析仍未能百分之一百證明經濟不能壓倒民主。因為分析中所運用的「對民主步伐的滿意程度」，只是市民對一條民調题目的回應而已，而且該問題沒有對民主一詞下任何確切的定義。「民意」本來就難以捉摸，一個人的思想尚且可以異常複雜和矛盾重重，更何況是一個社會的集體思維？經濟好轉時，更多市民心裏想要民主，但他們有多願意付出實際努力去爭取？他們會用甚麼方法爭取？會願意接受甚麼方式的妥協？當繁榮和民主之間看似有衝突時，市民又會怎樣選擇？九七年以來的經濟不景，曾否改變了香港市民對自己與政府的關係的理解？這些都是本文沒有解答的問題。只是，到了這一步，我們已經再沒有現成的資料可以用作更深入的分析了。

但總體而言，若根據已有的資料和分析結果來下結論，我們可以說，縱使在「七一」前的香港，經濟壓倒民主這論點也是沒有客觀事實支持的。相反，經濟好轉甚至可能有助市民將關注點轉移到推動民主上。其實，除了以上提到的後物質主義外，「經濟發展為民主發展的先決條件」，在比較政治學裏也是一個很早就被提出來的觀點。

那為甚麼香港會有「經濟壓倒民主」這種說法存在？這可能是部分人士一廂情願的想法，但也是香港的歷史和社會背景的產物。這種說法只顧指向一個神話般的「純經濟城市」，完全忽略了香港過去二十年來風雨飄搖，政治、社會、文化，以至經濟本身都歷經極大的變遷。

以上的分析結果也再次指出了部分親中人士對「七一」遊行的錯誤理解。「七一」的部分誘因是市民對政府無力挽救香港經濟感到不滿，這大概不需要否定。但「七一」同時是市民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爭議的不滿，是市民對一個不尊重民意的政府的不滿，這也是不能否定的。經濟和政治因素並存，但兩者之間不一定存在著甚麼關係。政府若嗅到經濟怨氣和政治怨氣混在一起，便以為是經濟怨氣弄出政治怨氣來，那就大錯特錯了。

註釋

1 政府及特首民望的調查問題如下：

1. 你對特區政府的整體表現滿不滿意？（答案分別為非常滿意，滿意，一半半，滿意，非常不滿意，不知道／難講）
2. 現在請你用零至一百分評價你對特首董建華的支持程度，零分代表絕對不支持，一百分代表絕對支持，五十分代表一半半，你會給特首董建華多少分呢？

2 滿意程度和不滿程度來自同一條問題。當然，當滿意政府的市民比例越多，不滿政府的市民比例便 越少。但兩個百分比卻沒有完美的相關。所以在分析中，「滿意政府程度」和「不滿政府程度」被當作兩個不同的變量。

3 較為明顯地未被列為「政治或社會危機」的是九九年上半年度有關居港權問題的爭議。在居港權問題上，政府的 做法雖有可非議的地方，民主派也大肆抨擊特區政府要求人大釋法的舉動，但大部分市民當時是支持政府的做法的。所以筆者認為那不算是一個令政府在市民心中的威信陷入危機的爭議。有關香港市民對居港權爭議的意見，可參考Joseph M. Chan, Kenneth Leung and Francis L. F. Lee, "Abstract principle versus concrete interest: A study of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opinion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 4 這些結果根據的是迴歸分析中的非標準化迴歸係數，並沒有在表二中被列出來。
- 5 這次分析中所用的「社會或政治危機」是一個很簡單的變量，一方面是因為筆者自行決定了甚麼事件算作「危機」，這無可否認帶有武斷的性質。同時，將所有「危機月份」的數值設成1，亦即是假設了所有「危機」對社會有同樣的震撼。這假設明顯不完全符合事實。不過，若不接納這假設，分析將會變得過於複雜。而分析結果亦顯示這假設是尚可接受的。
- 6 有關歐美民主社會中經濟狀況對民意及公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可參考Morris Fiorina,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及Han Dorussen and Michael Taylor, eds., *Economic Voting* (London: Routledge, 2002)。
- 7 有關這一點，筆者早前曾在一篇論文中較詳細的討論。見Francis L. F. Lee (2002). "Smoothing out the public voice: Covering popularity ratings of a non-popularly elected government on Hong Kong newspap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2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eoul, Korea.
- 8 有關市民對民主狀況評價的問題為：你對特區政府推行民主的步伐滿不滿意？（答案分別為非常滿意，滿意，一半半，滿意，非常不滿意，不知道／難講）
- 9 這結果來自迴歸分析中的非標準化迴歸係數，並沒有在表四中被列出來。
- 10 有關「因果責任」和「治理責任」兩個概念和它們與民意之間的關係，可參考Shanto Iyengar, *Is Anyone Responsible? How television frames political issue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1 可參考Agnes S. Ku, "Postcolonial cultural trends in Hong Kong: Imagining the local, the national, and the global", in Ming K. Chan & Alvin So, ed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Hong Kong*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 12 可參考Ronald Inglehart,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及Russell Dalton, *Citizen Politics*, 2nd Edition (New Jersey: Chatham, 1996), 92-97.

李立峯 美國史丹福大學傳播學博士，現任香港城市大學英文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主要為政治傳播、新聞學及民意研究。

陳韜文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傳播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研究興趣包括國際傳播、政治傳播及新聞研究等。